

研究論文

# 多元媒介嵌入與作為儀式的都市空間實踐 ——一項基於武漢市東湖綠道的田野研究

陳剛、王繼周

## 摘要

20世紀中葉以來，全球範圍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綠道運動」。本項研究以武漢市東湖綠道為研究對象，首先探討了不同形態的傳播媒介如何參與東湖綠道這一都市空間建構；其次，展示了漫遊者在其中的典型都市空間實踐；最後，闡述了這些都市空間實踐的意義。研究發現，在東湖綠道內，藉由諸如廣播、「天眼」等七種傳播媒介而展開的信息傳播與擴散消解了空間環境的不確定性，成為秩序感和安全感的重要來源。同時，東湖綠道的多元媒介基礎設施在視覺、聽覺等多個維度成為結構「儀式語境」的關鍵元素。在此情境下，漫遊者三五成群自發地在全景廣場搭建帳篷，席地而坐，耳邊環繞著東湖綠道廣播裡舒緩的音樂，或享用美食，或凝望眼底的湖光山色，或與同伴閒談……這與彌撒儀式有頗多暗合之處。景觀凝視、騎行、乘快艇等都市空間實踐的日常性、規則性、象徵性使之成為一種抵抗現代庸常

陳剛，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興趣：媒介社會學。  
電郵：cgcg105@sina.com

王繼周（通訊作者），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武漢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後。  
研究興趣：新媒體與社會。電郵：wjizhou2007@163.com

論文投稿日期：2018年5月16日。論文接受日期：2019年6月17日。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3期(2020)

生活的儀式。然而，在公共生活領域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夠製造儀式，東湖綠道營建過程與漫遊者空間實踐標識了其作為權力產物的社會事實。由此，東湖綠道成為社會控制和社會治理的有力途徑。

關鍵詞：媒介、儀式、東湖綠道、都市空間、田野調查

---

Research Article

## **Multi-Media Embedding and Urban Space Practice as Ritual—A Field Study Based on Donghu Greenway in Wuhan**

Gang CHEN, Jizhou WANG

---

### **Abstract**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20<sup>th</sup> century, there has been a huge greenway movement in the world. First,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different forms of media participate in the urban space construction of Donghu greenway. Secondly, it shows the typical urban space practice of the rover. Finally, it expound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urban space practices.

It is found that in the Donghu greenway, the dissemination and diffusion of information carried out by seven kinds of media, such as broadcasting and “Tian Eye,” dispels the uncertainty of the space environment and become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a sense of order and security. At the same time, the multi-media infrastructure of Donghu greenway has become a key element of a structural “ritual context” in many dimensions, such as vision and hearing. In this context, the Rover three spontaneously set up tents in the panoramic square and sit on, surrounded by soothing music from broadcasts, enjoying food, gazing at the eyes of the mountains and lakes, or chatting with companions. This connotes a lot for the mass ceremony. Landscape gazing, riding,

---

Gang CHEN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media sociology.

Jizhou WANG (Postdoctoral Fellow, corresponding author).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new media and society.

*Communication & Society*, 53 (2020)

speedboating and other urban space practices of the daily, regular, symbolic so that it becomes a kind of resistance to modern rituals of ordinary life. However, in public life, not everyone can create rituals. The Donghu greenway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Rover space practices identify social facts as a product of power; thus, Donghu greenway has become a powerful way of social control and governance.

**Keywords:** media, ritual, Donghu greenway, urban space, fieldwork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Chen, G., & Wang, J. (2020). Multi-media embedding and urban space practice as ritual—A field study based on Donghu greenway in Wuha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53, 57–89.

## 致謝

本研究是教育部基地重大項目「互聯網傳播新形態與中國傳播能力建設研究」(17JJD860003)的階段性成果。衷心感謝《傳播與社會學刊》諸位匿名評審專家、編輯為改善本研究而提出的深具建設性的寶貴建議。

## 研究背景與研究問題

旅遊因引發精神狀態的變換而具備了對個體生命的標誌意義，「離家」與「在家」、「神聖—世俗」交替規律性的社會指示性使旅遊被視為世俗儀式(張進福, 2013)，從而成為旅遊人類學研究的重要論域。這為本項研究帶來啓示意義，此項研究將武漢市東湖綠道與上演於其中的漫遊者行動置於儀式的理論框架下展開考察。作為城市的一項「綠色基礎設施」(green infrastructure)，綠道(greenway)是在城市規劃、景觀生態學等研究領域中延展開來的一個學術概念，通常指涉一個綫型開敞空間。其不僅具有水資源保護、污染治理、濱岸棲地改善、促進生物多樣性的傳統功能，還以休閒娛樂、文化教育等為目的(Bischoff, 1995; Rigolon, 2013)。同時，近些年越來越多的綠道研究者和設計者試圖將綠道與美好生活勾連起來，某種程度上，這也是營建綠道的初衷。因循古希臘「好生活」的倫理，Bischoff (1995)提出，綠道應滿足以下幾點人類興趣：(1) 身體活動的興趣；(2) 認識自然世界的興趣；(3) 交往的社會興趣；(4) 表達感受、情緒和想法。也就是說，綠道作為一種開敞的公共空間，不僅具有生態價值，還體現出重要的社會意涵。接引如是邏輯，處身於城區內的東湖綠道儼然變成了一種另類的都市公共空間。因此，它是一項關聯著人們日常生活和幸福感的公共性議題。正如有漫遊者<sup>1</sup>所言，「一時之間，東湖綠道成了一條充滿歡聲笑語的幸福之路」。

現代意義上綠道的源頭可回溯至20世紀初美國著名設計大師弗雷德里克·勞·奧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完成的第一條真正意義上的綠道——美國翡翠項鍊——波士頓公園綠道系統。20世紀中葉以來，從德國魯爾區綠道到美國東海岸綠道，在全球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綠道運動。而中國大陸的綠道實踐相對較晚，直到近年一些地方才將綠道納入城市發展規劃之中，並作為一項重要的城市發展戰略。

本研究以武漢市東湖綠道為田野研究對象。其實，早在2012年東湖綠道就已經被提上了規劃設計日程，但囿於種種困擾，2015年底才使得東湖綠道的建設成為可能。2016年12月，首期東湖綠道正式對公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3期(2020)

眾開放，全長28.7公里，將東湖落雁、聽濤、磨山三大景區連接起來，由湖山道、湖中道、磨山道、郊野道四條主題綠道組成：湖山道全長6.2公里，從武漢大學東門一棵樹(風光村)處進入，可感受山水穿行之美；湖中道全長6公里，從梨園廣場由城入湖，著力展現東湖純粹之美；磨山道全長5.8公里，環繞磨山而建，將磨山的諸多歷史文化景點勾連在一起，致力於彰顯深厚的荊楚文化內涵；郊野道全長10.7公里，充分展現湖灣生態之美，探尋郊野田園之趣。<sup>2</sup>儘管人文地理學家段義孚(2005：21)不無洞見地指出，「我們希望逃向的自然已經不再是自然，而是『自然』這一迷人的概念」。但是，此項研究的田野調查表明，在當下現代都市人高度理性化的日常生活結構中東湖綠道的山水、人文之美之於漫遊者蘊含了一種逃向「自然」的可能，而這是通過發生於其間的一系列日常生活儀式達成的。

此外，綠道內共修建25處驛站和服務點，可提供導覽、諮詢、餐飲、衛生間、自行車租賃等服務，驛站還配備母嬰室、淋浴室、醫療救護、自助圖書館等。因此，甫一面世就獲得不少人的青睞，據媒體報導稱，東湖綠道曾連續6個周末遊覽人數接近30萬(梁爽、焦艷、張勇，2017)。2017年12月26日，東湖綠道二期提前開放，由湖城道、湖澤道、湖林道、森林道、湖町道等五大主題綠道構成，全長73.28公里，與一期綠道環環相扣，形成了頗為壯觀的百里綠道景觀。據此，結合研究者田野調查中的觀察和困惑，本研究提出以下具體研究問題，並從儀式的視角展開討論：

研究問題一：在當下高度媒介化的社會，不同形態的傳播媒介如何參與東湖綠道這一都市空間的建構之中？

研究問題二：漫遊者在東湖綠道內主要有哪些典型的都市空間實踐？

研究問題三：如何理解這些都市空間實踐的意義？

本研究選擇武漢市東湖綠道作為研究對象主要基於以下兩點考慮：其一，雖然東湖綠道存在時間較短，但從《武漢市綠道系統建設總體實施方案》、《武漢市綠道系統建設規劃》、《武漢市綠道系統建設管

## 多元媒介嵌入與作為儀式的都市空間實踐

理辦法》到成為聯合國人居署「改善中國城市公共空間」示範項目，可以看出，東湖綠道作為一項制度化產物，其「入世」不僅是一個經科學、嚴謹論證的系統過程，還產生了較大社會影響力；其二，東湖綠道一經面世就受到漫遊者的普遍青睞。在田野調查中，一位觀光電瓶車司機向研究者證實了這一盛況：「平時的周末都會有30萬，清明節小長假至少要有40多萬人，那時候這條路上面啊是水洩不通啊！整個路段基本上都是人，除了山裡面稍微強一點點以外。我們的喇叭一天都要摠燒了好幾個。」東湖綠道官方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11月18日，東湖綠道迎接了800多萬人次的漫遊者，其中95%的漫遊者表示會再次到訪東湖綠道（傅雪嬰、晉曉慧，2017）。

## 文獻探討

### 都市空間的相關研究

#### I. 都市空間與人的異化

在社會學視野中，對城市空間或都市空間的研究算得上是一項經典研究議題。馬克思、恩格斯較早地把城市的興起及其對人們生活的影響納入批評的視野，其不僅是先進生產力的集中地，也是資本主義矛盾彰顯最尖銳的地方。

柏林高歌猛進的都市化之路給瓦爾特·本雅明留下了深厚的個人記憶，加之19世紀末20世紀初巴黎、莫斯科、法蘭克福等大都市的迅速崛起使得本雅明的學術視線多從「都市」這一意象鋪展開來。作為一個批評家和思想家，本雅明致力於對都市生活的荒謬之處展開批判，這種批判集中體現在都市的崛起將帶有「人性東西」的靈韻經驗摧毀。在他看來，往昔講故事的人在講述的故事中浸潤了自己的經驗，這門技藝傳達的是一種經驗而不是信息。而在現代都市空間裡，這樣的老式敘事藝術已由新聞報導代替，這種訴諸感官的報導對老式敘事藝術的代替反映了經驗的日益萎縮（黃春燕，2006），經驗變得越來越貧乏了。在社會學家格奧爾格·齊美爾筆下，都市人具有「理性化強」、「精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3期(2020)

於計算」、「人情淡漠」、「厭倦享樂」等四個方面的鮮明特徵(鄧莊, 2010)。齊美爾的這一思想同樣被後來的芝加哥學派的代表人物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所承續。

因此,不管是本雅明、齊美爾,還是芝加哥學派的路易斯·沃思,他們對都市空間中人的生存狀況的批判可以說都是對馬克思城市學說中「城市是資本主義罪惡最生動的體現」的不同程度演繹,這種罪惡體現為都市空間崛起給人帶來的異化現象,但他們卻忽略了「城市也是社會進步力量最充分發展的空間」面向。

## II. 都市空間的政治經濟學鏡像

都市空間是一座城市的根本性結構要素,今天的城市被理解成不同的空間實體(Grabkowska, 2018)。正如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約翰·帕爾教授(John Parrr)觀察到的,「城市不是日益被作為自我權利的焦點而是更寬廣空間的中心」(Parrr, 2007)。顯然,東湖綠道作為一個都市空間並不是自在或自為的,而是充滿政治性和戰略性(stratégique)的,如同法國思想家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筆下的公園——「和空間一樣,自然也被政治化了,因為它被引入到了那些有意識的和無意識的戰略中」、「被佔據」、「被管理」、「被戰略化」成為空間的一種宿命(亨利·列斐伏爾, 2015: 5)。因此,權力成為考察空間的一個重要面向。熱衷於將權力、資本與空間進行勾連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空間轉向」(spatial turn)以降的學術潮流,從歐洲大陸蔓延至全世界。因為在此之前,空間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基本是一個隱沒的話題,英國著名人文地理學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曾描述了這種狀況:在馬克思、韋伯以至涂爾幹等經典社會學家那裡,地理和空間的問題往往被覆蓋在歷史和時間之下(莊友剛, 2011)。

歷史性地看,從古至今權力一直亦是貫穿於中國城市實踐中的一條明晰的綫索。中國古代都城的空間是中央集權體制的一部分,不同層級的政府對都城的空間管理和控制都十分嚴格的。對都城空間的佔有原本就是一種身份和地位的象徵,在中國封建制度崩潰之前,北京的很多園林都是皇室、皇親國戚以及王公貴族等階層的私有空間(史

## 多元媒介嵌入與作為儀式的都市空間實踐

明正, 1995)。相較之下, 街道、戲院、茶館、寺廟則帶有更多平民屬性。「近代政治改良精英努力向西方看齊, 試圖與舊社會決裂, 並建設一個全新的社會, 因此, 西方城市中的廣場、公園等, 被作為中國城市建設的模板而加以效仿, 近代化的北京開闢的最重要的公共空間是公園」(孟超, 2017: 47) 如果說在當下的都市空間中「權力的邏輯」隱遁於資本的身後, 那麼, 新中國成立後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權力對都市空間的影響與控制依然是一個顯在的事實。

### III. 都市空間的媒介轉向

如果將媒介限定在大眾傳媒的範疇內, 那麼媒介與城市或都市的關係便顯得尤為密切。羅伯特·帕克 (Robert Park) (1987) 認為, 報紙是形塑一座城市生態的第一要素。除此之外, 作為社會學家, 他還將電話、電車、電梯, 乃至建築納入考察視野, 並提出這些服務於城市人口流動的媒介同樣是形構城市生態的首要要素。與帕克觀點相暗合, 澳大利亞學者斯科特·麥奎爾 (Scott Mcquire) (2013: 1) 近年提出, 媒體城市成為我們社會一個獨特的居住環境, 這也就意味著, 現代都市是一個「媒體—建築複合體」。

在塑造都市社會的過程中, 信息傳播技術正在變得越來越重要, 導致的直接後果就是「距離的死亡」和「地理的終結」(Cairncross, 2001; O'Brien, 1992)。具體而言, 在信息技術的影響下, 固定的地方和空間變得更具流動性, 人們的活動不再被傳統的空間所束縛。信息傳播技術提升了人類活動的時空靈活性, 最終導致行動和地方關係的改變。流動性變成了都市空間的新的組織邏輯 (Zhen & Chang, 2016)。因此, 有研究者認為, 以移動性和靈活性兼具的手機為代表的移動網絡創造了一個混雜的地理區域 (hybrid geographies), 在這裡, 通訊基礎設施覆蓋了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 (Berry & Hamilton, 2010)。

另一方面, 現代傳播媒介也日益介入到城市實體空間的建構之中, 以至於城市規劃設計者和城市管理者也無法忽視信息傳播基礎設施的結構性作用 (Townsend, 2000)。以城市中的電子屏幕為例, 電視屏幕離開家走進城市時會發生什麼? 澳大利亞學者斯科特·麥奎爾問道。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3期(2020)

在21世紀的城市公共空間，不再是如街道和露天廣場一般的簡單物質結構，也不是僅僅由電子媒介的虛擬空間來定義，而是出現在物質和非物質空間的複雜互動中，他將這種混雜的空間命名為「媒體城市」。

有研究者對城市空間中的屏幕文化展開研究，學者Chris Berry將其概念化為「Public Screen Cultures」。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21期)組織了一期專題討論「公共屏幕文化」，國內外一些著名文化與傳播研究者參與其中。

#### IV. 都市公共空間與傳播

都市公共空間與傳播交織在一起大致產生了三個研究進路：

其一，都市公共空間的媒介呈現研究。伴隨著現代化、城市化的推進，都市報紙不僅致力於建構「城市公共空間」，而且隨著對城市認識的深入，發現、尋找和確立深層的「城市精神」成為許多報紙的「更高目標」(曾一果，2011：93)。

其二，都市公共空間裡的傳播與交往研究。公園作為城市的重要設施，是市民休閒的物理空間，是文化傳播的公共空間，也是城市傳播的載體(熊月之，2015)。不僅如此，空間實踐行為本身也需要與他人交流，甚至需要多人協商、合作才能完成，因此，在一定意義上，空間實踐與傳播行為相重疊，空間實踐不能不包含傳播行為(謝靜，2013)。

其三，作為媒介的都市公共空間研究。在這一研究進路下，孫璋(2011)的研究發現，上海外灘作為一種都市公共空間，既是東西文化交流的一個結果，本身又作為一個媒介構築了人與人、人與社會的新型關係。曹兵武(2016)對於博物館這一典型都市公共空間的考察體現了類似的邏輯。本研究承續了這一研究進路，將東湖綠道作為一種另類媒介展開田野考察。

#### 綠道的相關研究

1959年，根據「綠道」(Greenway)這一術語的提出者威廉·懷特(William Whyte)的觀點，其由「greenbelt」和「parkway」複合而來(Whyte,

## 多元媒介嵌入與作為儀式的都市空間實踐

1959, p. 67)。20世紀中後期以降，綠道成為城市規劃、景觀設計、景觀生態等領域中的一項焦點研究議題。

趙海春、王韞、強維(2016)等學者認為，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國外的綠道研究經歷了三個主要階段：第一階段是關於綠道發展史的研究，例如，Fabos提出的五階段論——雛形時期(1867–1900年)、景觀時期(20世紀初至20世紀50年代)、環保綠道規劃時期(20世紀60年代至20世紀70年代)、綠道運動命名及發展停滯時期(20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90年代)、國際運動時期(1990年至今)；第二個階段是綠道規劃設計研究，綠道的規劃設計可劃分戰略決策、規劃方法、設計研究和規劃評價為四個層級；第三階段則是綠道的綜合功能研究，這一層面的研究始於20世紀90年代以後，研究發現，綠道具有生態環境保護功能、遊憩功能、經濟功能等。個案剖析也是綠道研究的一個不容忽視的面向，例如，Little(1990)在《美國綠道》(*Greenways for America*)一書中歸納分析了16個具有代表性的綠道項目，被認為是綠道規劃設計的啓蒙書。

20世紀80年代，綠道作為一種實踐和理念開始傳入中國大陸。近年來，北京大學景觀規劃設計中心、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等機構成為中國大陸綠道研究的重鎮。

### 儀式的相關研究

20世紀初以降，儀式研究便走出其宗教學、人類學、民族學的「原鄉」，在整個人文社會科學大花園中生根發芽、開枝散葉。大家名流的「傾注」不僅進一步延展了其理論豐富性，還不同程度加劇了分歧與衝突，使其成為一個邊界模糊的研究地帶。倘若對「儀式」進行界定，從神話學派、功能主義、詮釋主義、結構主義、象徵主義的視角瞭望便能看到異樣的景象，有的甚至大相徑庭，以致彭兆榮(2007: 1–17)認為：儀式是一個具有理解、界定、詮釋和分析意義的廣大空間，是一個「巨大的話語」，具有多維解讀的可能。

埃米爾·涂爾幹開創性地討論了宗教儀式，涂爾幹的儀式學說直接或間接影響到了馬林諾夫斯基、列維斯特勞斯等後學對儀式的理解。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3期(2020)

超越儀式的宗教性和神聖性，大衛·科澤(2015：11-14)指出，與其說神聖之物是超自然的存在，不如說是社會建構的產物。毋庸置疑，絕不僅僅專屬前現代的或傳統的社會，現代政治生活和權力運作同樣離不開儀式(郭于華，2000：5)。政治儀式是權力生產和再生產的一種特殊方式，塑造和維護了權力系統的政治合法性(王海洲，2016：11)。涂爾幹和道格拉斯等人的研究表明，儀式暗含了社會控制的性質和能力，這至少表現出以下幾個層面的意涵：(1)通過儀式中權力和權威的力量實現對社會的整體性把握；(2)通過儀式的方式達成對社會人群分層的集中和集結；(3)經由儀式實踐檢視社會群體內部的分化情況，進而化解衝突(彭兆榮，2007：77)。在媒介與傳播研究領域，上世紀末詹姆斯·凱瑞重估「儀式」的傳播學價值以降，傳播學者便報以極大熱情，一些學者使用其考察電視、節日/節慶、集體行動等(郭建斌，2012；卞冬磊，2009；周勇、黃雅蘭，2015；雷霞，2018；劉國強，2016)。

旅遊(journey)與儀式具有密切的關係，誠如著名人類學家特納(1978)所言「如果朝聖者是半個旅遊者的話，那麼，一個旅遊者就是半個朝聖者」。既然如此，將旅遊行為置於儀式範疇進行考察就有了邏輯前提(彭兆榮，2007：343)。20世紀末期，美國著名人類學家納爾遜·格雷伯恩和迪恩·麥康奈爾較早地將儀式運用於旅遊研究，由此，儀式分析成為旅遊人類學和旅遊社會學領域中一個重要的研究進路。

由此可以看出，儀式的多元性和複雜性。但一般而言，儀式是指一種有規律的象徵性活動，具有重複性、規則性和象徵性等顯著特徵。本研究亦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這一概念的。在大衛·科澤(2015：11)看來，「什麼是真正的儀式」並不是一個可被研究的實體，而是一種分析類型，借此幫助我們處理混亂的人類經驗，將之整理成井井有條的框架。因循如是邏輯，本研究將儀式作為分析框架，透過剖析武漢市東湖綠道增進對發生於現代都市空間內混雜的人類經驗的理解。

## 研究方法

本項研究以儀式為理論視角，不僅聚焦於傳播媒介在結構儀式語境中的作用，還致力於探討作為一種儀式的漫遊者都市空間實踐及其意義。顯然，對此進行探討的首要任務便是走進田野，從而獲取第一手的研究資料。東湖綠道的一棵樹入口與武漢大學僅一路之隔，這為田野調查提供了極大便利。

作為一種研究方法，田野調查以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為具體的技術操作手段。也就是說，其要求研究者在這一過程中通過「觀察發生了什麼，傾聽人們說了什麼，經由正式或非正式訪談進行提問」(Hammersley & Atkinson, 2007, p. 3)等技術搜集研究資料。參與觀察所得屬「體感證據」之類，尤其是「視覺證據」，瓦爾特·本雅明對巴黎的研究就依賴於此。與此同時，在針對東湖綠道的田野調查過程中，研究者還注重「聽覺證據」的搜集，具有一定經驗的田野調查者會發現：田野調查並不是單純地「我問他答」，而是在此基礎之上，浸入研究對象的生活世界，進而在特定的情境之中尋求理解之道(黃盈盈、潘綏銘，2017：68)；也就是說，在田野作業中要考慮到情境因素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自然情境下獲得的研究資料更具真實性和可靠性。John Brewer (2000, p. 10)就曾指出，資料收集應該在自然情境(naturally occurring settings)之下捕捉人類的社會意義和日常活動。所以，在本研究中經常可以看到通過「旁聽」而得來的聽覺證據的使用。例如，路人不涉及個人隱私的「閑言碎語」和不經意間的感嘆等，它們大多是有關東湖綠道的言說。

具體而言，研究者於2017年2月到2018年3月間，在東湖綠道開展了持續的田野調查。2017年2月，研究者在全景廣場訪談到了第一位漫遊者，他識破了研究者的緊張，並說「你們別緊張，有什麼儘管問吧」，才使研究者懸著的心稍微輕鬆一些。總體而言，田野的過程大略可分為兩個階段：2017年2月敲定選題到8月為起始階段，即第一階段，此階段的主要任務是全方位熟悉研究對象的基礎之上，圍繞研究問題搜集盡可能多的經驗材料，這一階段的難點在於短時間內如何「化生為熟」。因此，這一時段的田野調查基本維持在每周2-3次的頻率，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3期(2020)

每次持續時間不低於3小時(偶遇少數極端天氣除外)，並以「事無巨細」的態度堅持撰寫田野筆記，田野調查期間共撰寫田野筆記4萬餘字，拍攝現場圖片1267張，這成為本研究中的重要資料來源；2017年9月至2018年的3月屬研究的第二個階段，這一階段採取了「一邊寫一邊田野」的策略。從2017年9月開始，研究的重點逐漸轉向了對經驗材料的處理，並試圖闡明其隱含的內在邏輯，在此基礎之上撰寫出論文初稿，這一時期的難點主要在於如何「化熟為生」。

本研究還以問卷調查作為輔助性的研究方法。2017年9-11月，研究者對東湖綠道的漫遊者進行了問卷調查，主要圍繞兩種方式展開：其一，研究者和研究助理獨自發放調查問卷；其二，11月本研究招募了三名調查員，在他們的幫助下展開問卷調查，在開始工作之前對他們進行了簡單的培訓，並提醒注意其中的倫理問題。考慮到東湖綠道人口流動性較強，問卷以偶遇抽樣(Random Sampling)的方式發放，共回收有效問卷242份。面對年紀較大的遊玩者，填寫過程中研究者給予了必要的指導。在問卷調查過程中，讓人驚訝的是，有被訪者理直氣壯地向研究者質問「你們自己填，跟我們填有什麼區別？」與此同時，考慮到問卷調查本身的不確定性，問卷調查得來的數據證據並不孤立使用，而是作為輔助證據出現，注重不同證據間的相互驗證。

## 研究發現

### 都市空間的多元媒介嵌入與「儀式語境」

儀式總是發生在一定的空間之中。第一次進入東湖綠道，這裡的由信息傳播基礎設施構成的媒介生態便給筆者以非凡的體驗。在如今高度媒介化的社會之中，形態各異的傳播媒介成為一種理解都市空間的「當代」要素。本部分旨在回答第一個研究問題，即不同形態的傳播媒介如何參與東湖綠道這一都市空間的建構？

2017年2月9日的田野筆記中粗略記錄了研究者初次與東湖綠道相遇後觀察到的媒介圖景：

## 多元媒介嵌入與作為儀式的都市空間實踐

進入圓樁，是東湖綠道的木質導覽圖，中英文字樣，緊挨著自行車租賃處。騎行過第一個彎道便可聽到廣播聲音入耳。還有時尚的路標，路標是綠道一路上不中斷的风景。偶爾看到臨時通知牌，路途中還有幾家便利店，一處便利店旁有一座LED屏幕，流動播放著景區宣傳片。

在後來的田野調查中，研究者統計發現，東湖綠道內的信息傳播基礎設施十分完善，主要有路牌、路標、路引、導覽圖、廣播、「天眼」<sup>3</sup>、即時對話裝置、LED (Light Emitting Diode) 顯示屏等七種傳播媒介所構成(如表一所示)。問卷調查結果顯示，81%的漫遊者認為東湖綠道道路兩側廣播裡播放的音樂會讓他們感到愉悅；對於82%的漫遊者而言，東湖綠道的路標、路牌、導覽圖具有引路作用。

表一 東湖綠道傳播基礎設施的類型

文字媒介	路牌
	路引
	導覽圖
電子媒介	廣播
	「天眼」(包含人臉識別系統)
	即時對話裝置
	LED顯示屏

2017年5月研究者對東湖綠道的傳播基礎設施的空間分佈進行了分段式調查和統計，具體作業情況如下：5月1-2日，郊野道；5月4日，磨山道；5月18日，湖山道；5月24日，湖中道。統計發現，東湖綠道廣播261個、「天眼」444個、路牌64個、路引57個、即時對話裝置51個、LED顯示屏7塊、導覽圖25處。下面將結合田野材料著重呈現「廣播」、「天眼」以及「LED顯示屏」是如何作用於東湖綠道的。

### I. 廣播：將音樂與信息撒播

聲音是理解儀式的一個重要面向。大部分的儀式自始至終在音聲境域 (soundscape) 的覆蓋之中展現，對於儀式參與者而言，音聲是增強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3期(2020)

和延續儀式行為及其氣氛的一個主要媒介(曹本治, 2008: 13)。研究者的田野調查發現, 東湖綠道的廣播主要具有兩個功能: 其一, 播放音樂, 行走在東湖綠道, 總能夠聽到廣播裡悠揚的歌聲, 從早到晚, 不停播放音樂, 多為流行音樂。在初期的田野調查中, 研究者經常聽到:《我相信》(演唱者楊培安)、《我的歌聲裡》(演唱者曲婉婷)、《我想你》(演唱者蘇打綠)……後來也經常聽到一些英文歌曲和古典音樂, 經常看到騎行者跟隨著廣播裡的音樂輕聲或旁若無人地哼唱起來。其二, 傳遞信息, 眾所周知, 東湖綠道全長28.7公里, 加之遊玩者眾多, 物品遺失, 或小孩子與家人走散便是常事。所以, 東湖綠道廣播的又一功能便是隨時播放尋人/尋物信息。以下是幾則尋人信息的文本內容:

請劉振洋小朋友聽到廣播後迅速趕到落雁景區, 你的家人在那裡等著你, 或者尋求身旁工作人員的幫助, 給你的家人通個電話, 他們非常的著急。謝謝你的配合。(2017年2月11日)

各位遊客大家好, 下面播報一則尋人啓事: 請沙宇翔聽到廣播後速到華僑城綠地公園飲水機旁, 你的媽媽在那裡等你。東湖綠道感謝你的配合, 祝你遊玩愉快!(2018年10月1日)

漫遊者如何將自己的訴求傳遞到「播音室」呢? 這就需要使用佇立在道路兩側的「即時對話裝置」, 遊客只需按下即時對話裝置中間的按鈕, 便會自動接通到播音室, 與播音員通話。如此一來, 在東湖綠道這個特定空間內, 播音室與即時對話裝置就構成了一個獨特的社會互動系統。東湖綠道官方數據顯示, 截至2017年11月18日, 東湖綠道共幫助遊客廣播尋人啓事985起, 尋物啓事414起, 失物招領428起(傅雪嬰、晉曉慧, 2017)。

有時, 也會播放通知類的信息。例如, 2017年5月10日, 廣播中循環播放著明天播撒農藥, 提醒遊客注意的消息:「親愛的遊客朋友大家好, 下面插播一條溫馨提醒: 5月10日、12日期間, 綠道工作人員會對郊野道——鵝詠陽春至落霞歸雁, 播撒農藥吡蟲啉, 請遊客注意安全, 不要隨意採摘野果、花卉……」(2017年5月10日)。

## II. 「天眼」：安全感的給予者

2017年7月初，不少媒體都在關注這一新聞：一位漫遊者在東湖綠道悠閑地騎行，被東湖綠道九女墩驛站的人臉識別系統和「天眼」抓拍到後經網上自動動態比對發現，這位漫遊者疑為逃犯，最終被警察抓獲。以下是新聞報導〈東湖綠道動態人臉識別系統首抓網上逃犯，人臉相似度達97.44%〉（《武漢晚報》2017年7月10日）的部分內容：

武漢晚報7月12日訊（記者萬勤、實習生洪苗苗、通訊員王藝臻）在人海中精確抓拍每個人的頭像，系統比對，進行追蹤，找到相似度達97.44%的人臉目標。7月10日，本報報導一名潛逃多年的逃犯在東湖綠道騎車健身，被東湖綠道的人臉識別系統辨別出，最後被東湖警方抓獲後，受到讀者和網友的廣泛關注。……

在東湖綠道的媒介生態之中，「天眼」應該算是最為密集的信息傳播基礎設施了，這從東湖綠道媒介生態地圖中亦可窺得一斑。與「天眼」相互配合的是，東湖綠道還安裝了41套人臉識別系統，該系統的技術內核是基於大數據的人臉檢測算法，將抓拍到的面部表情與數據庫進行對比後可確定抓拍對象的身份。在深度訪談中，雖然多位受訪對象並不知曉東湖綠道的人臉識別系統，但「天眼」是顯而易見的。客觀上，「天眼」和人臉識別系統的有效運作可以消除東湖綠道複雜環境的不確定性，給漫遊者以安全感。多位漫遊者在深度訪談中談及了這一點。例如，一位漫遊者說：「這裡的路況本身就挺複雜的，像這邊（指全景廣場附近）人還挺多的，到了郊野道和磨山道有時候人挺少的，尤其是磨山道，心裡的警惕就會提高一些，但好在有攝像頭和那個橙色的報警東西。前一段，還聽說晚上磨山道有搶劫的。」除此之外，「天眼」和人臉識別系統還可以用來尋找走失的老人和小孩。

## III. LED大屏幕：宣傳與公眾參與的揉合

根據田野調查所得的材料，東湖綠道內七塊LED電子屏幕顯示的內容大致可以歸為三類：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3期(2020)

第一類為健康生活方式的倡導。例如，2018年10月1日，研究者在東湖綠道風光村入口處LED顯示屏上便看到這樣的倡導內容，並且不間斷循環播放：

遠離煙草，崇尚健康，愛護環境。

小小一支煙，危害萬萬千。

拒絕煙草，珍愛生命。

……

第二類為政治宣傳與社會動員話語，內容多為標語性質或口號性質的簡短話語，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敢為人先，追求卓越」的武漢精神等內容的流動播放。2017年5月2日在郊野道高鐵競跑附近的LED屏幕部分內容如下：

加快建設現代化、國際化、生態化大武漢！

堅持以人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

以坐不住的緊迫感、等不起的責任感、慢不得的危機感，頑強拼搏分離實現趕超發展！

第三類為安全知識宣傳。例如，2017年9月6日的田野調查中，LED顯示屏上滾動播出「反恐知識宣傳」，從「常見恐怖襲擊手段」、「如何應對恐怖襲擊」等方面以圖文並茂的方式展開反恐知識宣傳。2018年10月1日，東湖綠道風光村入口處LED顯示屏上播放著「平安東湖，人人參與，維護穩定，人人有責，加強治安防範，建設平安東湖」。

每一種儀式的實踐活動都要在特定的「儀式語境」下才能進行和發生(張兵娟, 2016: 231)。在東湖綠道這一都市空間內，經由諸如廣播、「天眼」等多元傳播媒介而展開的信息傳播與擴散消解著東湖綠道空間環境的種種不確定性，塑造著空間秩序，亦成為漫遊者安全感的一種來源。同時，東湖綠道的多元媒介基礎設施在視覺、聽覺等多個維度成為結構「儀式語境」的關鍵元素。

## 視覺儀式、騎行與快艇衝浪：漫遊者的都市空間實踐

東湖綠道不僅被不同形態的傳播媒介所建構，而且其亦作為一種媒介與漫遊者的日常生活世界發生互動。在漫遊者的生活世界裡，東湖綠道之旅被視為尋求心靈解放之途，由此，作為一種儀式的漫遊者都市空間實踐便具有了發生的可能。本部分旨在回答第二個研究問題，即漫遊者在東湖綠道內主要有哪些典型的都市空間實踐？

田野調查發現，景觀凝視、騎行、快艇衝浪等漫遊者的都市空間實踐構成了一種儀式化的行為。田野調查中一個典型的日常場景引發了研究者將東湖綠道內漫遊者的現代都市空間實踐與儀式勾連起來：春風和煦的午後，漫遊者三五成群自發地在全景廣場搭建帳篷，屈腿席地而坐，耳邊環繞著東湖綠道廣播裡舒緩的音樂，或享用美食，或凝望眼底的湖光山色……這與彌撒儀式頗多暗合之處。

「儀式」的言說雖然從19世紀末走來，但現代社會依然無處不在，從個體的修飾到市民群體的遊行、選舉，再到節日、婚姻、彌撒等，皆為儀式（卞冬磊，2009）。儀式通過其神聖性把個體從世俗生活帶入崇高的神聖世界，現代文明進程中社會系統的巨大變遷使神聖儀式的重要性正在減弱，而儀式的世俗化則逐步增強，世俗儀式（secular ritual）充斥著社會生活，社會正經歷著泛儀式化的進程（張進福，2013；Moore, 1980）。朝聖和旅遊作為「移動世界的新隱喻」被認為是分別以最神聖和最世俗的社會形象進入大眾視域（張進福，2013）。旅遊人類學的研究表明，朝聖本身是現代旅遊的一種早期形式，兩者甚至有相互轉化與融合的趨勢。雖然東湖綠道官方和新聞媒體通常將「漫遊者」描述為「遊客」，但是「漫遊者」在東湖綠道裡的空間實踐卻與旅遊有著較大差別。研究者的田野調查發現，漫遊者到訪東湖綠道是一種重複性和日常性的行動。然而，對於一般旅行者而言，今年去了三亞旅行，明年有機會旅行的時候幾乎不會考慮再去三亞旅行。而東湖綠道卻是漫遊者經常去的地方。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在東湖綠道的到訪者中，武漢本地人佔到71%，外地人僅佔29%；當被問及「這是你第幾次來東湖綠道時」，多達88%的到訪者不止一次來到東湖綠道，官方的調查同樣可以證明這一點，「民意調查顯示，95%來過東湖綠道的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3期(2020)

遊客表示會再次前來遊玩」。如此之故，東湖綠道或多或少切斷了一些與「旅遊」相關的想像，與純粹的旅遊行動具有很大不同，它指向了「日常性」和「可重複性」。這與儀式的重複性特點不謀而合。雖然有關儀式的界說比較複雜，但通常而言，儀式作為一種有規律的象徵性活動，重複性、規則性和象徵性等是其顯著特點(楊華、何斌，2010)。本研究亦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這個概念的。毫無疑問，漫遊者在東湖綠道內的都市空間實踐是在特定空間規則下展開的，東湖綠道廣播中經常播放的「遊客須知」標識了這一點：

- 一、東湖綠道實行免費遊覽，無需購票。
  - 二、綠道內禁止機動車、電動車、人力三輪車、滑輪、滑板、雙人車通行。
  - 三、綠道內禁止私人性質商業售賣及活動。
- ……

## I. 視覺儀式的生成

視覺作為人類的一種日常生活實踐，是人們同周遭世界產生聯繫和交往的方式。在知覺現象學家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2008)看來，世界即我們之所見，人類的生命和生活秩序經由一定的感官和知覺經驗而塑造。東湖綠道這一都市空間對漫遊者生命秩序的建構正是通過作用於漫遊者的感官和知覺而完成的。

如果說20世紀30年代之前未進入開發階段的東湖是一道純粹的自然風光，那麼，如今的東湖綠道則是一道視覺奇觀。從田野材料來看，這種視覺奇觀至少有兩個構成部分組成：其一，以湖光山色為主的視覺景象。漫遊者發出的「這裡的風景真美」之類的感嘆成了視覺奇觀的一種表徵，散落在田野筆記中的記述也可以證明這一點：

2017年3月29日 晴

今天下午原本打算「跟蹤」一個漫遊者，進而觀察他在這裡的行為。從一棵樹進入不久，在楓多山觀光車搭乘點我遇到一位外地

## 多元媒介嵌入與作為儀式的都市空間實踐

漫遊者。……在全景廣場下車後，我表明目的後，提出想跟隨她遊玩，她試圖以「我沒來過這裡，也沒有明確的目的，只是隨便走走」的說辭拒絕我。當我說出「正好我可以給你帶路」時她才同意我的跟蹤。從全景廣場換成觀光車到磨山北門，而後幾經周折抵達梨園廣場，然後原路返回。一路上，她不斷向我強調這裡的風景很好，山清水秀。

其二，以湖光山色為底色的「視覺事件」，即那些發生在東湖綠道空間內能夠讓遊玩者「屏息駐足」，產生視覺快感或非凡視覺體驗的現實圖景，既包括有組織的藝術展、馬拉松類似的賽事，又包括「求婚」、「cosplay 出片」等個體層面的儀式性展演。這些「視覺事件」的上演都以東湖綠道秀美的湖光山色為浪漫底色。

視覺奇觀建構的視覺經驗和視覺快感最終將留存在漫遊者的生活經驗之中，也就意味著：其一，它有可能進入漫遊者的個體記憶深處，隨時等待著被打撈和被激活；其二，「留存」還會以「拍照—展演」（這種展演一般通過微博或微信朋友圈展開，極少數的漫遊者會通過網絡生活論壇展演）的方式再現出來。在空間轉換過程中而完成的視覺奇觀可以給漫遊者帶來一種視覺愉悅和視覺快感。問卷調查結果顯示，53%的受訪者認為，欣賞東湖綠道的湖光山色會感到心情比較愉悅；36%的受訪者感到心情非常愉悅；64%的受訪者同意「平時學習、工作乏味，來這裡放鬆自己，讓我感到暫時從日常生活的煩惱中解脫出來」的表述。儀式的功能減輕緊張、恐懼、疑惑或痛苦，透過儀式必定要激發、維持或重塑群體與個體的某種心理狀態（張兵娟，2016：34）。從這個角度而言，東湖綠道的秀美風光和視覺奇觀形成了一種視覺儀式。

如果我們接受韋伯、齊美爾等思想家將現代人的生活境況形象地描述為「理性的牢籠」，那麼，東湖綠道漫遊者的景觀凝視行為，即是一種關乎「遁出」和「捲入」的實踐。這種從程序化、機械化、冷漠化的生活狀態中的「遁出」類似於戈夫曼在考察公共場所中的社會互動時所論及的「幻想」、「出神」、「空想」，而與之尤為重要的區別是，東湖綠道漫遊者的「遁出」實踐依賴於身心的實質性位移。正是基於此，漫遊者重新捲入了一種世外桃源般的視覺經驗，這是視覺快感的來源機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3期(2020)

制，最終將留存在漫遊者的生活經驗之中，並參與其日常生活秩序的建構。

## II. 從「騎行」到「騎行儀式」：流動的身體實踐與自我感知

如果說漫步、乘車(觀光車)、騎行是三種進入東湖綠道的主要方式，那麼，騎行可謂是最受歡迎的方式。老鐵就曾拍了一組99張名為「武漢東湖綠道上的自行車王國」的圖片集，在集子的開篇他寫道：「綠道上最亮麗的風景當屬各類自行車，輪滑、童車、跑車、共享單車匯成了綠道上一道流動的風景綫，洋溢著幸福快樂笑臉的人們，騎著各式各樣、千奇百怪的自行車穿梭於綠道之上，使人彷彿置身於自行車的王國……」<sup>4</sup>

自行車作為一項身體技術(body technique)，沒有人天生就會騎自行車。於是，「我今天竟然把車子學會了」——「學騎自行車」是研究者在田野作業中經常能夠看到的場景。在這樣場景下，騎行作為一種「舊」的身體技術被重新激活，但卻隱含著不同的社會意涵，研究者在田野筆記中論述了這一點：

昨天與同學閒聊到共享單車，我隨口說了句「現在騎自行車復興了」，得到同學的反駁。今天反復思量，發現東湖綠道上的騎車和幾十年前的騎車完全是兩種不同的意涵。幾十年前騎車是大眾出行的一種方式，而且當時科技落後，替代性交通工具有限，所以，大多數人出行不得不選擇騎自行車，即使領導幹部有時也不例外。但是，現在東湖綠道上的騎行具有了不同的內涵，其一，是鍛煉身體的方式；其二，是對抗現代生活的一種方式；其三，滿足一些人的懷舊情結；其四，趕時髦，現在的單車多為共享單車，共享單車是一種新鮮事物。因此，它是人們現代生活方式的一部分。(2017年5月2日)

因此，從這個意義而言，「騎行」變成了「騎行儀式」，也就是說，騎行從「出行之必須」轉變成為了一種具有現代象徵意義的儀式化行為。騎行的空間實踐夾雜著「受苦」的身體過程。田野作業初期就有騎行者告訴研究者，「自己平時很少這樣子騎車，感覺肺都快累炸了」。

## 多元媒介嵌入與作為儀式的都市空間實踐

在上坡處，時常可聽到人們氣喘吁吁地感嘆「我好累啊」、「騎得好累」、「騎不動了」。在整個田野作業的過程中，無意之中總能夠聽到身旁穿行而過的騎行者發出「累啊，腿快斷了」、「我感到我的膝蓋骨在磨損」之類的感嘆。這一方面是由於東湖綠道路途較長，另一方面，「受苦」或「受累」對於大多數現代都市人而言是一種陌生的身體經驗。杜威(2015: 257)認為，在生命的世界裡，作為「活的生物」的有機體總是與其周遭的環境相互作用，在這樣的語境下特定環境的類型屬性一旦被分而視之或標識出來，知覺(sense)就產生了。作家蔣方舟借助馬拉松論及了這一點：毫無疑問，馬拉松是一種「受累」、「受苦」的身體經驗，而對身體的知覺在這種陌生的經驗中被喚醒和放大(蔣方舟，2017)。

心理學家羅洛·梅認為，20世紀以來人的主要問題是空虛。因此，羅洛·梅(2013: 77)說，「大多數成年人都嚴重喪失了對身體的覺知，以至於如果你問他們，他們的腳、踝、中指或者身體的任何其他部位有什麼感覺時，他們都無法回答。……他們把身體當作一個物體來操縱，就好像他們是在駕駛一輛卡車，直到他燒完汽油為止。」面對這樣的處境，人本主義者大聲疾呼，「我們需要重新獲得對我們身體的覺知」。作為「行動著的自我的場所」，「所有鍛造、改變身體，提升身體價值的活動，即便是伴有痛苦的活動，都屬主體性」(米歇爾·維沃爾卡，2017: 16)。

### III. 「快艇衝浪」的象徵意涵

在東湖綠道內，漫遊者的「快艇衝浪」實踐是一道別樣的風景綫。「東湖綠道建的不錯，應該只有我們這樣sa的才會花300坐個快艇」。<sup>5</sup>雖然快艇衝浪的價格不菲，但依然有人不少漫遊者乘坐。

本以為乘坐者外地人居多，在田野調查中卻發現，不少在武漢工作或生活的人也是快艇愛好者。他們通常三五成群地結伴乘坐，在田野調查中經常有意無意地聽到乘坐者歡快的尖叫聲。有一次聽到這般熟悉的聲音後，研究者當天的田野筆記中如是記錄道：「看著快艇從湖面劃起一道碧波，隨之一陣尖叫傳來，不時引得岸邊人矚目觀望。在東湖綠道待的時間久了，這樣的場景也不算新奇，對我也失去了新鮮感，但不容忽視的是，其實本質上，這跟坐過山車並沒有太多的區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3期(2020)

別，與其說是在平常生活中尋找刺激和心跳，不如說是一種抵抗庸常枯燥的生活政治。」(2017年4月30日)由此，快艇衝浪後「太刺激啦」的感嘆，成為在一定限度內擺脫、抵抗庸常生活束縛的一種方式。

有一次，同研究者一起拼船的陌生遊玩者不停地感嘆：「太刺激了，太刺激了」。「刺激」似乎成為了快艇沖浪者的一個共識，例如，有人在新浪微博中記錄道：

十一假期最後一天，據說到現在還有好多人堵在回來的路上，出門真是不容易，還好我機智地選擇了小黃車，一路暢通，東湖綠道的人也真多，天公作美，遊覽車，快艇幾乎滿滿的！說好，等我丫頭放假了也要她帶我去坐快艇，感覺在東湖上飄起來好刺激啊！<sup>6</sup>

## 分析與討論：經由儀式的自我形塑與權力施展

在「研究發現」的基礎之上，本部分將回答第三個問題，即如何理解這些都市空間實踐的意義？其實，透過「研究發現」已可獲取部分解答。本部分將從「個人—社會」兩個層面進一步考察此問題。

### 儀式與自我形塑

儀式不僅具有社會維繫和製造認同的功能，還具有消遣和娛樂的功能。前者功能是外部性的，而後者功能則是向內的，指向了儀式參與者的內部之自我的形塑。正如南希·芒恩所言，儀式一端是社會秩序的外部道德約束和類分，另一端則是個體行動者的內在情感和想像(李忱陽，2019)。特納(1967, p. 20)同樣指出，「儀式的展演在社會進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在具體的族群中起到了調整其內部變化和適應外部環境的作用」。對於儀式參與者同樣具有這般功能。

在這個意義上而言，漫遊者在東湖綠道的一系列都市空間實踐成為現代都市人抵抗高度理性化日常生活結構的象徵。在深度訪談中，一位受訪者的回答具有典型意義：

## 多元媒介嵌入與作為儀式的都市空間實踐

在這樣的環境(指東湖綠道)裡好舒服啊，我以後每個星期都要過來騎一騎，只要不下雨。我每天太壓抑了，在辦公室屋子裡看著牆，就像看到沙袋一樣，想打幾下。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東湖綠道成為人們對抗「鋼筋混凝土森林」般的現代生活的一個美好意象，蘊含了一種現代都市人逃離高度理性化日常生活結構的可能。東湖綠道在漫遊者那裡產生的精神狀態和心態變化恰似「朝聖」帶來的精神轉變，這種相似性使漫遊者的實踐可被視為「現代朝聖」或「世俗儀式」。漫遊者在東湖綠道內的「景觀凝視」、「騎行」、「快艇衝浪」等一系列都市空間實踐暗含了其追尋「本真性自我」的生命意義。

### 權力施展下的社會治理術

如何從「社會」的層面理解漫遊者在東湖綠道內一系列儀式化行為的意義？對這一問題的考察首先需要轉向探討另一個問題：誰是這種儀式或儀式化行為的製造者？

顯然，在私人生活領域，個人可以隨心所欲地製造儀式，但在社會的公共生活領域並不是所有人都有權舉行儀式(戴長征，2010)。研究者的田野研究發現，東湖綠道從謀劃到進入漫遊者的日常生活世界都離不開權力的運作，也就是說，漫遊者在東湖綠道內的一系列儀式化行為是權力運作的產物。從「謀劃」到「入世」東湖綠道經歷了一個嚴密而又科學的論證過程。在《武漢市綠道系統建設規劃》中有關「規劃編制背景」的述說可以約略窺見這一過程：

為全面貫徹落實市第十二次黨代會、市十三屆人大一次會議關於「加快推進武漢綠道建設」的有關指示精神，按照「專家領銜、部門合作、廣泛參與」原則，武漢市國土資源和規劃局組織武漢市規劃研究院編制了《武漢市綠道系統建設規劃》。

《武漢市綠道系統建設規劃》於2012年2月13號市政府第3次常務會議、2012年2月16日市委常委會審查並原則通過。於2012年4月25日獲市政府正式批覆。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3期(2020)

其後，圍繞武漢市綠道建設又頒布施行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例如，《武漢市綠道系統建設總體實施方案》、《武漢市綠道系統建設管理辦法》、《武漢東湖綠道管理規定(徵求意見稿)》、《東湖綠道運營管理標準(徵求意見稿)》、《武漢環東湖綠道選址規劃方案》等。東湖綠道正式開放以後，每逢人山人海的景象，總能夠看到警車和警察的身影，連同東湖綠道的保安，他們共同成為東湖綠道秩序的維護者。由此可以看出，從謀劃到「面世」，東湖綠道致力於漫遊者美好生活的塑造，漫遊者在東湖綠道內的景觀凝視、騎行、快艇衝浪等儀式化行為成為一種權力施展下的社會治理術。

## 研究局限

作為一年多田野調查的呈現，論文即將完成之時，東湖綠道剛剛開啓它的生命之旅。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還需要對其展開持續的觀察和研究。本研究通過田野調查對東湖綠道的研究為理解都市空間提供了一個另類樣本，因為像東湖綠道這般徜徉於城區內憑藉著名風景區而建造的綠道尚不多見，且較高程度的「可及性」也蘊含著豐富的都市空間實踐。與此同時，在既有的學術脈絡之中綠道主要是一個歸屬於城市設計與規劃、生態學、建築學等領域的探討對象；而毋庸置疑的是，東湖綠道為人而建，其間又演繹著豐富的行動實踐。因此，對於這樣一個都市空間需要更多交叉學科(尤其是社會學、傳播學、人類學、政治學)的持續研究才能更好理解其存在的社會價值和獨特意義。

## 註釋

- 1 本研究將東湖綠道裡「玩者」概念化為「漫遊者」，這一概念源於法國詩人波德萊爾，法語為「flâneur」，波德萊爾認為19世紀的巴黎出現了一種獨特的行為者，即「flâneur」，含有「閒逛者」、「浪蕩子」、「漫遊者」之意，這裡選擇使用「漫遊者」這一譯法，主要是與研究者在東湖綠道開展的田野調

## 多元媒介嵌入與作為儀式的都市空間實踐

查實踐相一致，很多來到東湖綠道的「遊玩者」都說自己漫無目的，並沒有明確的目標和目的地。故而，本文將這群人概念化為「漫遊者」。

- 2 引自東湖綠道官方微信簡介。
- 3 「天眼」是網絡視頻監控系統的形象化表述。
- 4 按照研究倫理，「老鐵」這一稱呼為訪談對象的化名。老鐵創作的圖片集「武漢東湖綠道上的自行車王國」發表在「美篇」社區中。
- 5 引自新浪微博「mollynnnn」，2017年2月12日。
- 6 引自新浪微博「熱情藍寶寶」，2017年10月8日。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卞冬磊 (2009)。〈從儀式到消費：大眾傳媒與節日意義之生產〉。《國際新聞界》，第7期，頁21-25。
- Bian Donglei (2009). Cong yishi dao xiaofei: Dazhong chuanmei yu jieri yiyi zhi shengchan. *Guoji xinwen jie*, 7, 21-25.
- 曹兵武 (2016)。〈作為媒介的博物館——一個後新博物館學的初步框架〉。《中國博物館》，第1期，頁77-82。
- Cao Bingwu (2016). Zuwei meijie de bowuguan—Yige houxin bowuguan xue de chubu kuangjia. *Zhongguo bowuguan*, 1, 77-82.
- 曹本治 (2008)。《思想—行為：儀式中音聲的研究》。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
- Cao Benye (2008). *Sixiang—xingwei: Yishi zhong yin sheng de yanjiu*. Shanghai: Shanghai yinyue xueyuan chubanshe.
- 大衛·科澤 (2015)。《儀式、政治與權力》(王海洲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原書 Kertzer, D. I. [1988]. *Ritual, politics, and pow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awei Keze (2015). *Yishi, zhengzhi yu quanli*. (Wang Haizhou, Trans.). Nanjing: Jiangsu renm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Kertzer, D. I. [1988]. *Ritual, politics, and pow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戴長征 (2010)。〈儀式和象徵：當代中國基層政治的控制藝術和權力技術〉。《江蘇行政學院學報》，第6期，頁87-93。
- Dai Changzheng (2010). Yishi he xiangzheng: Dangdai zhongguo jiceng zhengzhi de kongzhi yishu he quanli jishu. *Jiangsu xingzheng xueyuan xuebao*, 6, 87-93.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3期(2020)

- 段義孚(2005)。《逃避主義》(周尚意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原書  
Tuan, Y. [1998]. *Escapism*.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Duan Yifu (2005). *Taobi zhuyi* (Zhou Shangyi, Trans.). Shijiazhuang: Hebei jiaoyu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Tuan, Y. [1998]. *Escapism*.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鄧莊(2010)。《城市化進程中的大眾傳媒》。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  
論文。
- Deng Zhuang (2010). *Chengshihua jincheng zhong de dazhong chuanmei*. Wuhan  
daxue xinwen yu chuanbo xueyuan boshi lunwen.
- 傅雪嬰、晉曉慧(2017年11月24日)。〈95%遊客成回頭客，東湖綠道「走心」  
服務頻頻獲讚〉。《長江日報》，第12版。
- Fu Xueying, Jin Xiaohui (2017, November 24). 95% youke cheng huitouke, donghu  
lüdao zouxin fuwu pinpin huozan. *Changjiang ribao*, p. 12.
- 郭于華(2000)。《儀式與社會變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Guo Yuhua (2000). *Yishi yu shehui bianqian*.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 郭建斌(2012)。〈媒介儀式中的「家－國」重構與遊離——基於中國西南一個  
少數民族村莊田野調查的討論〉。《開放時代》，第5期，頁123-134。
- Guo Jianbin (2012). Meijie yishi zhong de jia-guo chonggou yu youli—Jiyu  
zhongguo xinan yige shaoshu minzu cunzhuang tianye diaocha de taolun.  
*Kaifang shidai*, 5, 123-124.
- 黃春燕(2006)。〈都市幻想：本雅明筆下的巴黎－柏林〉。《城市文化評論》，  
第1卷，頁141-147。
- Huang Chunyan (2006). Dushi huanxiang: Benyaming bixia de Bali-Bolin.  
*Chengshi wenhua pinglun*, 1, 141-147.
- 亨利·列斐伏爾(2015)。《空間與政治(第2版)》(李春譯)。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
- Hengli Liefefuer (2015). *Kongjian yu zhengzhi* (2nd ed.) (Li Chun,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 黃盈盈、潘綏銘(2017)。《我在現場：性社會學田野調查筆記》。太原：山西  
人民出版社。
- Huang Yingying, Pan Suiming (2017). *Wo zai xianchang: Xing shehuixue tianye  
diaocha biji*. Taiyuan: Shanxi renmin chubanshe.
- 蔣方舟(2017)。〈馬拉松是中產無聲的廣場舞〉。《新周刊》，第486期。

多元媒介嵌入與作為儀式的都市空間實踐

- Jiang Fangzhou (2017). *Malasong shi zhongchan wusheng de guangchangwu. Xin zhoukan*, 486.
- 羅洛·梅(2013)。《人的自我尋求》(郭本禹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原書 May, R. [1953]. *Man's search for himself*. New York: Dell.)
- Luoluo Mei (2013). *Ren de ziwo xunqiu* (Guo Benyu deng, Trans.). Beijing: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May, R. [1953]. *Man's search for himself*. New York: Dell.)
- 劉國強(2016)。〈作為互動儀式的網絡空間集體行動〉。《國際新聞界》，第11期，頁114–128。
- Liu Guoqiang (2016). *Zuwei hudong yishi de wangluo kongjian jiti xingdong. Guoji xinwenjie*, 11, 114–128.
- 梁爽、焦艷、張勇(2017年2月17日)。〈東湖綠道連續6個周末遊客近30萬，自駕從落雁景區進入更方便〉。《武漢晚報》，第6版。
- Liang Shuang, Jiao Yan, Zhang Yong (2017, February 17). Donghu lüdao lianxu 6 ge zhoumo youke jin 30 wan zijia cong luoyan jingqu jinru geng fangbian. *Wuhan wanbao*, p. 6.
- 李忱陽(2019年1月13日)。〈儀式的隱喻：新聞發布活動的另一種視角——以十八屆、十九屆新任政治局常委同記者見面活動為例〉。上網日期：2019年5月22日，取自人民網，<http://media.people.com.cn/GB/n1/2019/0113/c424558-30524653.html>。
- Li Chenyang (2019, January 13). *Yishi de yinyu: xinwen fabu huodong de lingyizhong shijiao—Yi shibajie, shijiujie xinren zhengzhiju changwei tong jizhe jianmian huodong weili*. Retrieved May 22, 2019, from <http://media.people.com.cn/GB/n1/2019/0113/c424558-30524653.html>.
- 雷霞(2018)。〈民間與官方的博弈：「非遺」文化中的儀式傳播——基於西和乞巧節個案〉。《新聞與傳播研究》，第6期，頁77–91。
- Lei Xia (2018). *Minjian yu guanfang de boyi: Feiyi wenhua zhong de yishi chuanbo—jiyu xihe qiqiaojie gean. Xinwen yu chuanbo yanjiu*, 6, 77–91.
- 米歇爾·維沃爾卡(2017)。《社會學前沿九講》(王鯤等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原書 Wieviorka, M. [2008]. *Neuf leçons de sociologie*. Paris: Robert Laffond.)
- Mixieer Weiwoerka (2017). *Shehuixue qianyan jiu jiang* (Wang Kun et al., Trans.). Beijing: Zhongguo da baike quanshu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Wieviorka, M. [2008]. *Neuf leçons de sociologie*. Paris: Robert Laffond.)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3期(2020)

- 梅洛·龐蒂(2008)。《可見的與不可見的》(羅國祥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原書 Merleau, P. [1979]. *Le Visible et l'Invisible*. Paris: Gallimard.)
- Meiluo Pangdi (2008). *Kejiande Yu Bukejiande* (Luo Guoxiang, Trans.)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Original book: Merleau, P. [1979]. *Le Visible et l'Invisible*. Paris: Gallimard.)
- 孟超(2017)。《轉型與重建：中國城市公共空間與公共生活變遷》。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
- Meng Chao (2017). *Zhuanxing yu chongjian: Zhongguo chengshi gonggong kongjian yu gonggong shenghuo bianqian*. Beijing: Zhongguo jingji chubanshe.
- 帕克(1987)。〈城市：關於開展城市環境中人類行為研究的幾點意見〉。帕克等(編)，《城市論文集——芝加哥城市研究文集》(頁48-62)。北京：華夏出版社。
- Pake (1987). *Chengshi: guanyu kaizhan chengshi huanjing zhong renlei xingwei yanjiu de jidian yijian*. Pake deng bian, *Chengshi lunwenji—Zhijiage chengshi yanjiu wenji* (pp. 48-62). Beijing: Huaxia chubanshe.
- 彭兆榮(2007)。《人類學儀式的理論與實踐》。北京：民族出版社。
- Peng Zhaorong (2007). *Renleixue yishi de lilun yu shijian*. Beijing: Minzu chubanshe.
- 史明正(1995)。《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設與社會變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Shi Mingzheng (1995). *Zouxiang jindaihua de Beijing cheng: chengshi jianshe yu shehui biange*.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 孫瑋(2011)。〈作為媒介的外灘：上海現代性的發生與成長〉。《新聞大學》，第4期，頁67-77。
- Sun Wei (2011). *Zuowei meijie de Waitan: Shanghai xiandaixing de fasheng yu chengzhang*. *Xinwen daxue*, 4, 67-77.
- 斯科特·麥奎爾(2013)。《媒體城市：媒體、建築與都市空間》(邵文實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原書 McQuire, S., [2008]. *The media city: Media, architecture and urban spaces*. London: Sage.)
- Sikete Maikuier (2013). *Meiti chengshi: meiti, jianzhu yu dushi kongjian* (Shao Wenshi, Trans.). Nanjing: Jiangsu jiaoyu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McQuire, S., [2008]. *The media city: Media, architecture and urban spaces*. London: Sage.)
- 王海洲(2016)。《政治儀式：權力生產和再生產的政治文化分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多元媒介嵌入與作為儀式的都市空間實踐

- Wang Haizhou (2016). *Zhengzhi yishi: Quanli shengchan he zaishengchan de zhengzhi wenhua fenxi*. Nanjing: Jiangsu renmin chubanshe.
- 謝靜 (2013)。〈地點製造：城市居民的空間實踐與社區傳播——J市「健身坡」的案例解讀〉。《新聞與傳播研究》，第2期，頁113–125。
- Xie Jing (2013). Didian zhizao: chengshi jumin de kongjian shijian yu shequ chuanbo—J shi jianshenpo de anli jiedu. *Xinwen yu chuanbo yanjiu*, 2, 113–125.
- 熊月之 (2015)。〈近代上海公園與城市傳播〉。黃旦 (編)，《城市傳播：基於中國城市的歷史與現實》(頁95–106)。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 Xiong Yuezhi (2015). Jindai Shanghai gongyuan yu chengshi chuanbo. In Huang Dan (Ed.), *Chengshi chuanbo: Jiyu Zhongguo chengshi de lishi yu xianshi* (pp. 95–106). Shanghai: Shanghai jiaotong daxue chubanshe.
- 楊華、何斌 (2010)。〈作為儀式的新聞獎——普利策新聞獎與中國新聞獎儀式建構對比分析〉。《東南傳播》，第5期，頁61–63。
- Yang Hua, He Bin (2010). Zuwei yishi de xinwenjiang—Pulice xinwenjiang yu Zhongguo xinwenjiang yishi jiangou duibi fenxi. *Dongnan chuanbo*, 5, 61–63.
- 約翰·杜威 (2015)。《經驗與自然》(傳統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原書 Dewey, J. [1929]. *Experience and nature*. Chicago: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 Yuehan Duwei (2015). *Jingyan yu ziran*. (Fu Tongxian, Trans.).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Original book: Dewey, J. [1929]. *Experience and nature*. Chicago: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 曾一果 (2011)。《想像城市：中國當代文學與媒介中的「城市」》。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 Zeng Yiguo (2011). *Xiangxiang chengshi: Zhongguo dangdai wenxue yu meijie zhong de chengshi*. Haerbin: Heilongjiang renmin chubanshe.
- 趙海春、王靛、強維 (2016)。〈國內外綠道研究進展評述及展望〉。《規劃師》，第3期，頁135–141。
- Zhao Haichun, Wang Dian, Qiang Wei (2016). Guoneiwai lüdao yanjiu jinzhanshu pingshu ji zhanwang. *Guihua shi*, 3, 135–141.
- 莊友剛 (2011)。〈西方空間生產理論研究的邏輯、問題與趨勢〉。《馬克思主義與現實》，第6期，頁116–122。
- Zhuang Yougang (2011). Xifang kongjian shengchan lilun de luoji, wenti yu qushi. *Makesi zhuyi yu xianshi*, 6, 116–122.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3期(2020)

- 張進福 (2013)。〈作為儀式的旅遊〉。《世界民族》，第5期，頁41–53。
- Zhang Jinfu (2013). Zuwei yishi de lüyou. *Shijie minzu*, 5, 41–53.
- 張兵娟 (2016)。《電視媒介儀式與文化傳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Zhang Bingjuan (2016). *Dianshi meijie yishi yu wenhua chuanbo*.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 周勇、黃雅蘭 (2015)。〈新聞聯播：從信息媒介到政治儀式的回歸〉。《國際新聞界》，第11期，頁105–124。
- Zhou Yong, Huang Yalan (2015). Xinwen lianbo: Cong xinxi meijie dao zhengzhi yishi de huigui. *Guoji xinwenjie*, 11, 105–124.

###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Berry, M., & Hamilton, M. (2010). Changing urban spaces: mobile phones on trains. *Mobilities*, 5(1), 111–129.
- Bischoff, A. (1995). Greenways as vehicles for expression. *Landscape & Urban Planning*, 33(94), 317–325.
- Brewer, D. (2000). *Ethnography*.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 Cairncross, F. (2001). *The death of distance: How the 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is changing our lives*.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Press.
- Grabkowska, M. (2018). Urban space as a commons in print media discourse in Poland after 1989. *Cities*, 72, 122–129.
- Hammersley, M., & Atkinson, P. (2007). *Ethnography: Principles in practice*. Routledge.
- Little, C., (1990). *Greenways for Ame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Moore, A. (1980). Walt Disney world: bounded ritual space and the playful pilgrimage centers.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53(4), 207–218.
- O'Brien, R. (1992). *Global Financial integration: The end of geography*. Londo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 Parr, J. B. (2007). Spatial definitions of the city: Four perspectives. *Urban Studies*, 44(2), 381–392.
- Rigolon, A. (2013). Greenways as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lessons from boulder, colorado. *Children Youth & Environments*, 23(3), 148–163.
- Townsend, A. M. (2000). Life in the real-time city: Mobile telephones and urban metabolism. *Journal of Urban Technology*, 7(2), 85–104.
- Turner, V. W. (1967). *The forest of symbols: Aspects of Ndembu ritual*.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Turner, V., & Turner, E. (1978). *Image and pilgrimage in Christian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hyte, W. (1959) *Securing open space for urban American: Conservation easements*. Washington: Urban Land Institute.

## 多元媒介嵌入與作為儀式的都市空間實踐

Xi, G., Zhen, F., & Chang, E. (2016). Measuring urban space of flows in information era: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Nanjing, 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Spatial Plann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4(4), 42–57.

## 本文引用格式

陳剛、王繼周 (2020)。〈多元媒介嵌入與作為儀式的都市空間實踐——一項基於武漢市東湖綠道的田野研究〉。《傳播與社會學刊》，第 53 期，頁 57–89。